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选 编)

(西班牙) 费南德·克劳丁

杭州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国际共运史教研室编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D16
K83
:2

005213

说 明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老战士费南德·克劳丁新著《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上、下卷，共九章。全书译稿尚在进一步校订润色中。为配合我教研室召开的当代国际共运讨论会，先选印三章，作为会议的参考资料。因系初稿，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正式出版时改正。

杭州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国际共运史教研室翻译组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目 录

一、第一章	解散	(1)
	漫长危机的终曲	(1)
	历史的讽刺	(7)
	承认破产	(19)
	本章附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	
	议原文	(27)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	
	共产国际的声明	(30)
	斯大林答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首席记	
	者问	(32)
二、第三章	独裁	(39)
	苏维埃样板的移植	(40)
	极端的集中制和俄罗斯化	(48)
	独裁的路线	(53)
三、第六章	共产党情报局	(69)
	卫星国的革命	(69)
	共产党情报局和新战术	(80)
	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退却	(89)
	第六章“共产党情报局”注释	(94)

第一章 解 散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斯大林 1924年

漫长危殆的终曲

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指挥中心”不复存在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仍继续存在，不过只是变成独立的共产党，不受“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所规定的义务的约束”^①罢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议所宣布的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并没有规定共产党之间的国际关系的另外形式，一点也不提及在将来建立另一形式的可能性，但如果严格地按照终止共产国际存在的那个文件来理解，这种形式至少应当这样：从受一个执委会指挥的，它的决议“支配着所有共产国际支部，并要迅速地加以贯彻”的“单一的世界共产党”支部^②，突然变成完全独立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国家

的党。要使这样完全独立的共产党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统一起来是困难的。在政治实践方面，第三国际象它的两个“前辈”一样，它的建立是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章程中所阐明的理论原则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的问题”③这个问题的国际性，就需要一个相应的组织。它的机构、作用、纲领等等，按照历史条件的变化，无疑必须进行修改，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怀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需要在具体组织形式中体现出来。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失败，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分子之间的内部斗争，导致了第一国际的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的解放仅仅看作是暂时的④。1914——1919年战争时期，大部分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抛弃了国际主义的观点，分别参加了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神圣同盟”列宁把他们的行为说成是“背叛”并立即把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来了。区别这个新国际与它的“前辈”的最明显特征之一，就是“国际”的利益绝对优先于“国家”的利益，它一开始，就把“各国运动的利益必须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这一点，上升为必须遵循的原则⑤。共产国际的每次大会都要重申这个原则。在第六次大会（1928年）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强调，为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工人们不分国界民族、文化、语言、种族、性别与职业的界限与区别，最密切地团结成各国无产阶级的统一的国际军队⑥。共产国际是这支“军队”的领袖和组织者，是这支“军队”的“总参谋”，它的历史任务是：精心制订和实施总战略，以便规定和联系世界无产阶

级军队在各国“支队”的活动。

列宁和它的追随者还认为：当社会矛盾变得尖锐，革命道路或许在那里直接打开缺口时，需要一个高度集中和受过训练的世界革命组织，这种组织在战时尤为必要。共产国际所采用的组织形式，显然考虑到防止1914年事情的重演，即要在战争来到的时刻，使第三国际不象第二国际那样崩溃。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号召所有支部，“把反对战争的斗争变得更加国际性，并为预期中的革命行动的国际协作作好准备，使他们在急需时刻有可能执行国际集团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行动，”大会还规定：“在战争爆发前，所有（共产国际）支部之间必须建立尽可能紧密的联系，并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千方百计地保持这些联系。”⑧第七次即最后一次共产国际大会（1935），批准第六次大会有关战争的决议，再次坚持曾被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采纳的列宁和罗沙，罗森堡的观点：“如果战争依然爆发，他们的责任是为迅速地结束战争而工作，全力以赴利用战争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群众，从而促进资产阶级统治的垮台。”⑨

战争爆发了。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着工人运动中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斗争。另外，战争——特别是德国进攻苏联后——并没有根据共产国际所精心设计的模式进行，呈现出了新奇独有的特征⑩。从共产国际的原则和它附后所处的条件出发，在战争期间和胜利时刻，有一个中央以保证世界无产阶级战略和战术的指挥好象越来越必要了。但是，正当“无产阶级国际部队”在从事最艰苦的反对法西斯斗争，与苏联临时结盟的，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明显表现出其险恶用心时，世

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则决定自动解散。

这是什么问题呢？象托洛斯基分子所立即宣布的那样是一个背叛的行为吗？或是象斯大林所宣布的那样，解散是“恰当的”，因为“它便利了各国热爱自由的爱国志士反对共同敌人”？还是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自己所声明的那样，作出这个决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历史经验，说明组织形式已经过时吗？

象批判地研究问题的人所讲的一样，也象我努力重新证明的那样，1943年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为了促进与罗斯福和邱吉尔的谈判，突然地解散共产国际，他们的目的不仅在于保证德国失败，而且保证“三大国”瓜分世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向共产党员隐瞒了真相——说什么解散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最根本利益的，说什么解散已有马克思及其随后的历史所树立的先例，等等。决议声称，共产国际已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並开了一张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清单。四分之一世纪后，苏联共产党仍然虚伪地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直至庆祝共产国际成立五十周年和解散二十五周年时，向几乎全部其他共产党解释的，也仍然如此。^⑪

实际上，斯大林之所以要这么急急忙忙地抛掉共产国际，乃是因为共产国际已经久患重病。当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事态进程，同共产国际预先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设想发生矛盾时，共产国际的在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死亡就结束了它漫长危机的最后阶段，也结束了列宁时代业已开始创造的前程。第三国际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它没有能力通过自我改造来克服本身矛盾的故事，这种自我改造本来是能够使

得它正确地反映现实，有效地按照革命的方法行动起来，改变现实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共产国际的解散所发生的影响，并不因为用了“集中的方法带来的组织危机”这个措施而有所限制。这个事件同时孕育着世界共产主义的危机，这个运动的死亡证写在共产国际的出生证上。其实，解散不能消除造成危机的因素，不论采用其它形式还是一成不变，只能把这些因素推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如果对这些因素不作彻底的考察，上述构成我研究主题的危机是不可理解的。换句话说，如果谁想把目前的共产主义运动危机分析得明白一些，那么他就必须分析共产国际的危机。这就是我在本书上卷专门研究共产国际的原因。我从分析解散开始，进而弄清楚最后得出的论点，以帮助人们理解全过程；而后来的研究又帮助我们回顾这个完全具有弦外之音的，关系着后来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共产国际的解散。

解散共产国际的正式声明包括三个文件，由于文件比较简短，我又要多次涉及，因此，我已全文复写出来。这些文件供我们使用的唯一的原始资料的：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和6月9日发表的声明以及同年5月28日斯大林的宣言。在主席团内部可能发生的讨论，其它共产党领导人发表的意见，斯大林干涉的具体内容，那时共产国际的解散与苏联政府所面临的战略问题和外交问题的真相，这一切仍收藏在苏联档案馆的秘密之中，我们不得而知。象许多共产国际的问题一样，我们在研究中遇到了众所周知的困难。正如1959年陶里亚蒂所指出的，“原始资料难以搞到，这些资料分散在各个地方，分散在出

版刊物中，这些刊物在西方几乎不可能买到。即使在苏联，历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文件也尚未再版。除材料困难外，另外还有一些与内容的实质有关的问题；这些内容，共产国际的历史是必须涉及的^⑬“对苏联领导人提出的谨慎的批评中的”“即使”应由“特别”来代替，以使更加符合实际。即使在陶里亚蒂写这几句话时——几年后显得更加准确——西方在重版的共产国际文件毕竟还是要苏联多。^⑭此外，马克思的批判主义不仅需要重新出版最好发表的公开文件，而且需要重新出版涉及共产国际的内部文件。当然，有关革命组织的历史，大量的活动是秘密的，甚至经过很长时间后，某些方面仍不可能公开。但是，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活动发生在1919年至1943年之间，另一方面，陶里亚蒂提及的“实质”基本上没有涉及与“阴谋技巧”有牵连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没有涉及政治性质的问题，如有关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共产国际与苏联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等等。显然，从理论上和从政治革命斗争的利益观点来看，那些事情无疑是耻辱的，并很具体地形成了批判地利用共产国际的丰富经验的障碍，这些经验是共产国际在二十五年生存中积累起来的。在第一国际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者“掌握”国际政治的“秘密”。他当然从不怀疑，最后证明马克思主义者掌握自己的组织秘密是那么难！尽管这些困难，从得到的文件中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与解散的直接因素有关的一些有用的线索（斯大林的目的），同时象我所讲的一样，证明解散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危机。

历史的讽刺

众所周知，“程序”问题有时是会发生的，在政治方面尤其如此。乍一看，解散共产国际的“程序”（见决议第七点和声明）象形势所许可那样地民主：大会当然不能召开，虽然根据章程，这样重要的问题，必须召开大会才能解决；但是，主席团“焦急不安”，没法由自己决定，于是便把问题交给支部考虑。结果有三十一一个支部包括“全部重要的支部”，都作了肯定的答复，没有提出异议。在战时条件下，难道还需要什么更多的“程序”吗？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审查一下这个协议的话，，不同形式的问题便出现了。首先，主席团的声明表明只有少数几个支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但根据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会议情况，那时应有六十六个党^⑮。那么，还有超过半数的三十五个党，“不可能呈报它们的决议”。这些党中，几乎全部是亚洲、非洲、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党。从共产国际声明中看出，所谓表示了自己观点的“最重要的支部”，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说就是除中国和叙利亚共产党外，没有一个亚洲共产党属于这一类——我临时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

此外，在提出意见的三十一一个支部中，有十四个支部（除苏联外）是在法西斯国家或被后者力量所占领的国家中进行非法活动的，它们由于战事而远离莫斯科。可以想象，这

些支部怎能在几天内回答主席团的请求呢？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回答”是那些共产国际支部的领导干部说出来的，他们是作为避难者住在莫斯科，毫无疑问，就是他们以各自的共产党名义，表示同意解散。

另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5月15日的决议一发表（这就是为什么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在会见斯大林时，能谈到英国“赞许”解散的评论的原因）；斯大林就于5月28日发表声明，提及解散已成了一个既定事实。因此，在主席团能够搜集代表们的正式赞成票数前，解散作为已决定的事实向全世界提出来了，支部的协商只不过是用于隐瞒已经实施的诡计。

这清楚地表明，解散共产国际是一个紧急的问题，迫不急待。但是，只凭纯粹的政令，似乎是远远不能办到的。这个解决的方案用所谓协商把戏之后把行政命令隐藏起来了。

为什么要这么急地使共产国际消失呢？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和轴心国在北非的失败，使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在望。当各国共产党在各自的大会上可以审查象解散国际组织那么重要问题时，有什么理由不等到底再作出决定呢？这在主席团的决议里并没有讲到，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国际经验证明：单独的国际中心不能领导运动，如果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后面我将考察这个观点——仍然没有证明解散的迫切性，如果那种不可能性的确是实际存在的话，那也必须待大会认可后，才能停止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工作。

这个迫切性的真正关键到底在斯大林的声明中表现出来了：“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恰当的，因为：它便利了各国爱好自由的爱国志士的工作……它便于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团

结成为统一的国际阵线来反对共同敌人“〔1〕，因为解散的结果”进一步加强了盟国的联合阵线”。这些论述的明确意义，在威廉·福斯特著的《三个国际的历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福斯特生前一直担任美国共产党主席，从1935年起他一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他本来素以与苏联领导人步调一致而出名，但他的书同斯大林主义者写作历史教科书的计划毫无二致，正由于这一点，下面这段文字实在太有趣了：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恰好在争取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斗争进入紧要关头的时候通过的。这点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个新战场极需开辟，以便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那些相信戈培尔所散布的关于共产国际的谰言的西方反动派正在拖延。共产国际的解散在资本主义世界所产生的良好反应，毫无疑问，在帮助解决这个症结上起了决定作用。几个月后（1943年11月至12月）召开了著名的德黑兰会议，最后决定了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⑩

这个“症结”的起因是这样：本来共产国际就没有正式抛弃过“世界革命”纲领，在人民阵线时期，它是东山再起，在苏德条约时期，它再一次宣扬了这个纲领，其后的发展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很快成了苏联的盟国，在“资产阶级世界”这个纲领继续得到认真的执引，因此，1943年12月14日的《纽约时报》写道：“俄国军队迅速地不可

〔1〕据福斯特著作原文，“反对共同敌人”应为“反对希特勒主义”

抗拒地继续朝西方推进。”他们的胜利使得希特勒刚要强加给世界的“新秩序”显出崩溃的征兆，但在苏联红军向前挺进时，他们仍然提出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求在他们的旗帜上写上别的什么口号……这些问题带来了危险。它们为纳粹实现希特勒逃脱最后的失败的希望所进行的最后宣传，提供了大量的口柄——这个宣传，以所谓欧洲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妖魔的复活来竭力恫吓世界，分裂美国，並为自己的体面求和铺设道路。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苏联军队不得不向前推进，消灭希特勒军队，但又担心德国失败所引起的革命结果可能会分裂反希特勒联盟。于是，以明确的全部有关的党所能接受的方法规定盟国胜利的目标，来解决这个“症结”是必要的，更何况，欧洲革命的前景，苏联的资本主义盟国是不会接受的。

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文件透露出来，证明罗斯福和邱吉尔正式请求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分离，但是，这个要求象水印图案一样，在某些文章中出现过。这些文章刊登在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最可信赖的报刊上，有的甚至是著名的高级官员写的。例如，《纽约时报》于1942年12月20日报道：“正是由于在托洛茨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支配下，共产国际造成了它的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活动后果”：使得希特勒“能够……破门而出，吓得许多德国人加了他的军队，並在其他地方包括美国赢得了一批类似十字军追随者，”1643年3月8日，美国副总统亨利·威尔逊谈到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时，声称“如果苏联一再信奉煽动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①7。正如

这一考察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战略的章节中所论述的那样，由于“盟国”不惜用取消和平加以威吓，斯大林向它们的讹诈屈服了，所以才抛弃了任何“广泛煽动世界革命”的念头，作为同美帝国主义达成分享“势力范围”的协议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正是斯大林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关于开辟第二战场，尤其关于这战场的位置选定的协议，正是分割欧洲大陆的一个决定性步骤。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终于打消了在“资产阶级世界”升腾而起的难以名状的疑虑。

这样，急于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就不言而喻了。尽管还有别的理由，但酝酿阶段完全同苏联的政治目的有关，是同它迫切需要向资本主义国家作出“保证”这件事有关。

可想而知，斯大林是等不及共产国际大会召开的，更等不及共产党领导集团在各自国家进行磋商（这决不是为了共产国际利益而出现的“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的失误）。不管怎样，归根结底，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关键，并不是共产党人之间的商讨，而是罗斯福和邱吉尔的考虑——正象罗斯福所指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世界”的态度。

我们顺便注意到（我不想详细研究枝节东西，这会使我们离题）共产国际的解散好象与其他若干措施相“吻合”的，而全部措施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不久后，斯大林接见了俄罗斯东正教会首领麦特罗波里当·塞捷斯（Metio Poltan Sergine）在长时间的和友好的会谈后，宣布了恢复东正教的决定。同时《国际歌》也不再作为苏联的正式国歌，由一首歌颂伟大的俄罗斯歌曲取而代之。五月十日，即解散共产国际的前五天，在莫斯科举行了由季米特洛夫主持的泛斯拉

夫大会——一种“改变近卫军”的象征。〔注2〕

但是，解散共产国际难道足以解除苏联的盟国对革命的害怕吗？斯大林说，这个措施是为着“加强盟国的统一战线”，便于促进其“共同的斗争”，因为解散揭穿了所谓莫斯科干涉其它国家事务，以便使它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也揭穿了所谓各国共产党似乎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根据外来命令引动的“诽谤”。斯大林说：“纳粹分子和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的敌人，”把共产国际看作是干涉的工具，因此解散最终会结束这些“诽谤”。

词典告诉我们，“诽谤”是一种诬告，是出于恶意来损害别人。如果谴责共产国际干涉别国事务是“诽谤”，那末这正说明共产国际实际上没有卷入各国的的问题，没有给各个共产党下命令。假使这样的话，那么解散并不意味着产生本质的变化，至少在消息灵通人士眼里是如此。对于那些把“诽谤”误解为真理的无知的人们，这种说法也只有宣传上的价值。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人，象罗斯福和邱尔吉这样的人会属于这个范畴吗？把决定整个时代的世界命运这样一个论点作为政治前提，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废除”一些不存在的东西，那末解散共产国际能给重大的外交事务中施加重要的——按罗斯福的说法是“决定性的”——影响吗？

斯大林心安理得地把二十五年的历史除用“诽谤”一词

〔注2〕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诬称“第三国际”为苏联的“近卫军”

——译者

概括外，全部化为乌有。共产国际的章程、纲领，决议表明它的存在，执行委员会根据它的明确目标，继续起作用：它通过相应的国内支部，领导各国革命斗争，以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战略，使这些国家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协调起来。各国资产阶级和世界资本主义总是利用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指控共产党员是根据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等等。列宁和共产党员不是用否定，而是用驳斥强加给他们的反动逻辑来回答这些指责。他们声明：所谓共产国际对各国的内政不容置疑的干涉符合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国内方面的斗争必须服从国际方面的斗争，苏联政府有义务帮助各国的斗争——这就是所谓干涉“内政”的明显表现，等等。而且，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自己也公开承认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的党”。还有，正是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对这个“诽谤”的说法断然予以否定。共产国际自动解散，並由此废除由“国际中心”处理各国运动面临问题的办法，这些声明亦即承认共产国际干涉了各国内政。因此解散共产国际不是终止了“诽谤”，而是终止了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措施促进了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谈判。

为什么斯大林要求助于谈论“诽谤”的诡计呢？他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对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隐瞒这个意义深远的让步的一个办法，这个让步使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人。似乎这样描写，解散才能用战争的计策这个遁辞得以解释——事实上，共产党员基本上是这样理解的。斯大林（更何况现在拥有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荣誉）转变成了圣人，共产国际又有计划地促进了这个转变，这是共产党员难以用批评精神看懂五月二十日声明的奥秘。⑮

斯大林不仅埋葬了“诽谤”，而且还企图使盟国放心，永不复发。实际上，他告诉它们：共产党不再是有组织的国际力量；从现在起，共产党的活动严格地限制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不提及任何共产党之间可能的国际联系及其意义所在，这无疑令人奇怪的。但是，对于帝国主义政界老手，所需要的既不是默许，也不是另行组织。他们认为联系仍然存在，不过是秘密地在起作用——即各国共产党和苏联这个中心的联系。除非解散共产党——不管斯大林有多大善意，这是没有希望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所要了解的主要问题是：莫斯科施加的直接影响是什么。一句话，就是在战争后期和战后时期共产党的政策是什么？象最后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所竭力主张那样，他们要全力以赴利用战争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群众，从而加快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垮台吗？正是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存在着斯大林对盟国作出的重大让步。其实，主席团的决议本身并不局限于解散共产国际。它的说明想尽可能地使那些作为反希特勒盟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满意：不仅作出了反对革命的可靠保证（共产党自己没有权力作出这种保证，即使它这样打算）而是它还给了资产阶级政党得到一个广泛的活动范围，并避开了任何危险。情况表明，资产阶级政党知道如何明智地利用这个方便。

反法西斯联盟，“没有政党和宗教的区别”（决议第四点）——这是策略上的一般表述，共产国际不顾客观事实笼统地把这种策略上的表述强加给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正是这一般的表述，可以包含五花八门的内容。众所周知，第一个反法西斯联盟的政治形式是人民阵线。后来，在把资产阶级